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ZILIAO

4

1988

总第54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YANJIUZILIAO

1988年第4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20,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100

ISBN 7-01-000409-9/Z·26

定价 1.70元

186 072961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8年第4辑目录

(总第54辑)

恩格斯一封未发表的信的草稿(1888年)	张慧文译(1)
马克思早期思想和哲学共产主义	赵仲英(11)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5—1846 年 在布鲁塞尔期间同莫泽斯·赫斯的 关系(二)	[苏]雅·罗基扬斯基 张田英 朱霞译(31)
论《大纲》中的“资本和利润”	[日]内田 弘 刘焱译(49)
马克思1866—1867年写作政治经济学 著作的纪事	[苏]Л·Р·米兹凯维奇 韩英译(65)
评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奥]古·埃克什坦 郑松译(73)

文献和资料

列宁主持召开的人民委员会会议 第4—10号记录	孙凌齐 王士云译(86)
关于“合作社”的百科全书辞条选译	丁世俊译(109)
合作社	(109)
列宁以前和列宁时期的世界合作社运动	(116)
列宁以前和列宁时期的俄国合作社运动	(121)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	(127)

农民经济合作化	(131)
合作社的类型	(131)
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	
计算(四)	[德]拉·冯·鲍尔特凯维茨 章丽莉译 (149)

传记和回忆

恩格斯 1888 年夏的美国和加拿大之行	
.....	[民主德国]托·波勒 王 竞译 (180)
约翰·马克林传	[英]威·诺克斯 周清荣编译 (194)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黑格尔化的	
马克思主义(二)	[美]诺·莱文 张翼星译 (203)
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科学的贡献	洪镰德 (222)

《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选载

莱·科拉科夫斯基	苑 洁译 (230)
亚·沙夫	苑 洁译 (233)
拉·米利班德	李惠斌译 (235)
詹·R·奥康纳	王吉胜译 (238)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作选登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法]路·阿尔都塞 杜章智译 (240)
---------------------	-------------------------

评介和书讯

美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百科辞典》	水 月 (263)
-------------------------	-----------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学》简介徐 汶 (265)

法国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当代马克思》第三、

四期目录李其庆 (266)

读者·作者·编者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统一战线”一词.....编 者 (268)

恩格斯一封未发表的信的草稿(1888年)

致某报编辑

阁下(尊敬的同志):

报纸已经报道,四位德国社会主义者、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和发行人伯恩施坦、莫特勒、施留特尔和陶舍尔被瑞士联邦委员会驱逐出瑞士了,“理由是他们滥用了所给予他们的好客之情”¹。《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8年来一贯小心谨慎,避免冒犯瑞士以及瑞士的各种组织机构,况且报纸的语言总的来说也从未象在最近几个月里那样温和,因此这一严厉措施就不能不更加令人感到惊异。

现在我们见到了联邦委员会驱逐决定的正式文本和它所说明的理由²,而那些理由实在令人惊异,联邦委员会想使我们相信,他们注意《社会民主党人报》首先不是因为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而是因为一份幽默杂志,这份杂志是1887年1月由该报报社印行的,并且只出了一期!³ 其实《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自它创刊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德国当局高度的密切注视,而且也受到瑞士当局(迫于德国当局的压力)的监视。

因此,联邦委员会认识到监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必要性以后,便指出了(正如现在它对我们所讲的那样),该报“使用煽动性的语言反对德意志帝国当局”。这就是说,报纸并没有要求对德国的国家政权实行真正的暴力反抗,更不要说反对瑞士的政权了。报纸仅仅揭露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炮制者们及其执行工具所干下的卑鄙行径,并且是直言不讳。然而这种做法就是“滥用”一个共和

国的“好客之情”，可是这个共和国自己却年复一年地举行成百上千的纪念活动来庆祝威廉·退尔的谋杀行动⁴，并且以为各国流亡者提供避难权而自豪。

我们得到的消息还说，这种煽动性语言所招致的后果是，向《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出了正式警告，但是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消息说，此后编辑们虽然尽力避免使用“粗暴无礼的言词”，但是他们还是拒绝“对报纸的原则纲领作任何改动”，此外，“他们还重新发表一些呼吁暴力的文章”，尽管附有编者按语，“可以使人们相信报纸是温和而有分寸的”。为了证明这是一个严重违法的行为，联邦委员会引述《社会民主党人报》于1888年4月7日重新发表1866年(22年前!)500个德国人在苏黎世通过的一些决议⁵这件事作为证据，因为那些决议号召德国人民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的政府。当时出席会议的德国人谁也没有因为这些决议而在1866年受到指控。可是在1888年，《社会民主党人报》只是报道了这些事实，仅此一点就使该报的四名工作人员被驱逐出瑞士。

总而言之，所列举的理由是荒谬的。然而联邦委员会不敢公开它所以要采取这一措施的真正理由，这却是一个事实。其真正的理由是，俾斯麦和他的内务大臣普特卡默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竟然能够在瑞士揭发了由德国警察派遣到瑞士的那一伙密探和造谣生事的奸细而大发雷霆，这伙人是为了获取一些证据，以使政府能够延长和进一步强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普特卡默由于在帝国国会被揭露和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而遭到失败，驱逐编辑部正是他对这一失败所实行的报复，而联邦委员会则充当了普特卡默恭顺的奴仆。驱逐我们的同志意味着德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影响已经扩大到瑞士，意味着从现在起普鲁士警察的“带炸药的人”⁶在苏黎世也享有同在柏林一样的官方保护。

可以断言，现在英国是欧洲唯一的一个仍然有避难权的国家。无疑，俾斯麦也会和从前一样企图将英国拉进国际政治警察网，以便即使在英国也要把德国社会主义者置于他的“小戒严状态”之

中。英国的政治家们会不会也准备对他曲意逢迎呢？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英国工人一定知道如何阻止他们的政府，不去扮演象瑞士联邦委员会现在所扮演的这种卑怯的角色。让我们寄希望于此吧。

阁下（尊敬的同志），我永远忠实于你（我们的友情长存）。

（张慧文译 宏道校）

注 释

- 1 1888年4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 2 因为1888年4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发排时尚未得到驱逐决议和驱逐理由的说明，所以报纸只能在4月28日第18号才予以发表。就英文本而言，恩格斯所作的逐字逐句的引文与此相一致。
- 3 《红色精灵，社会民主党人幽默画刊》（见1887年1月8日、15日和29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 4 威廉·退尔（Wilhelm Teu），相传为14世纪的瑞士民族英雄，神箭手，曾用箭杀了残暴的奥地利总督，由此引发瑞士人民起义，推翻了奥地利的统治，宣布瑞士为自由邦。恩格斯这里所说“威廉·退尔的谋杀行动”，指的就是上述传说。——译者注
- 5 《在瑞士的德国共和党人决议》，见1888年4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 6 是指其挑衅行为同诱使他人制造爆炸事件有联系的奸细。

译 后 记

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所在为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版版第一部分第31卷（包括1886年10月至1891年2月恩格斯的著作）做准备工作时，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发现了一封出自恩格斯手笔的信的草稿，是寄给几家英文报纸的，至今不为人所知。恩格斯写这封信的背景是，1888年4月18日瑞士联

邦委员会决定将4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尤·莫特勒、莱·陶舍尔和海·施留特尔驱逐出瑞士。当时伯恩施坦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莫特勒是该报发行人，陶舍尔负责印刷工作，施留特尔则是苏黎世社会民主党出版社的负责人。因此驱逐他们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机构。

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俾斯麦政府无疑是制造这起事件的元凶。自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日益强大，对此俾斯麦政府感到极为不快。尤其是在瑞士编辑出版的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早已成为宣传革命战略策略、揭露敌人的有力武器，不仅在组织人民进行斗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在党组织适应新的斗争条件、不断扩大影响和增强战斗力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俾斯麦政府更是怀恨在心。

1888年初，俾斯麦企图通过加强暴力措施来抵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日益增长的影响。1月14日他向帝国国会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延长和加强反社会党人法，并明确要求这个法律也应适用于严厉惩戒在德国传播《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活动。因为在这之前，1887年12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揭露了德国警察当局在国内外一些地方的密探，特别是在苏黎世活动的卡·施勒德尔和在日内瓦活动的克·豪普特，^①使俾斯麦的国家在全世界面前名誉扫地。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上述揭露经过长期的深入调查，作了充分准备，有力地配合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辩论俾斯麦法案时的斗争。恩格斯始终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定期得到奥·倍倍尔等人报告的消息。例如1888年1月9日倍倍尔写信告诉恩格斯说：“找到的材料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俾斯麦—普特卡默一伙还从未象这次一样大倒其霉，全部材料都得到官方证

① 见《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67页。

明。这一次可得闹腾一番了。辛格尔首先开炮，我跟着猛轰。”^②《社会民主党人报》详细报道了帝国国会的辩论，并且摘要发表了辛格尔和倍倍尔的讲演。不出所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这些行动在国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俾斯麦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遭受一次惨重的失败。俾斯麦虽然获得了同意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多数，但在加强这一法令方面却未能如愿以偿。《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动不仅沉重打击了俾斯麦的政策，而且首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直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时，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被逐出家园的危险。李卜克内西就是其中之一。1888年4月4日他的妻子娜·李卜克内西写信给恩格斯说，在最近几个星期，“取消国籍法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们全家的头上，“如果不揭露那些瑞士奸细。这不幸可能就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已经被赶出德国了。”

由于在帝国国会惨遭失败，普鲁士内阁副首相兼内务大臣冯·普特卡默加紧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驱逐出瑞士。1888年4月1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了驱逐决议。1888年5月2日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俾斯麦终于在伯尔尼贯彻了自己的意图。苏黎世人是第一批由于帝国国会的胜利而不得不吃苦头的人。……我建议你在今后寄往德国的信里，谈报纸的事情，千万要极其谨慎。在这里目前的状况下，说不定那一天当局又企图对我们提起什么诉讼，然后对我们宣布禁止通信。我们必须特别避免露出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保持关系和联系的任何迹象。”^③

早在1887年2月迫于俾斯麦政府的压力，瑞士政府就曾经调查过《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活动，并对编辑部的“文风”加以指责，它要求编辑部建立一种“更温和适度的文风”，停止“对‘德意志帝国’显要人物”的攻击。在说明这次驱逐的理由时也提到了那

^② 见《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第370页。

^③ 同上书，第379页和第380—381页。

次的调查。1888年初,瑞士政府加紧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迫害活动,尤其是在帝国国会就加强反社会党人法进行辩论期间。例如瑞士政府曾通过报纸发布通告,再次警告《社会民主党人报》负责人,应“冷静地、客观地进行讨论”,避免“煽动、谩骂和诽谤行为”。通知还说,已责成苏黎世州政府监督编辑部的活动,并将结果告知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保留“对有关人员随时采取措施”的权力。

情况显然日趋严重。1888年2月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公布了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紧急公函,并且表示希望,“在瑞士无论是人民还是当局”都高度“尊重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所以,我们不必担心,瑞士会执行“德国的警察法令。”编辑部重申报纸的使命说:“我们所肩负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保护被压迫者和受迫害者,同压迫者和迫害者进行斗争。当争取和平和正义的斗争要求我们作出牺牲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准备去承担这种牺牲,这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需要。今后,我们仍将忠实于我们的任务,本着上述精神进行活动。”

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紧急公函是即将对报纸编辑部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前兆。这时驱逐决议已提交联邦委员会并正在进行讨论。1888年4月10日施留特尔写信给恩格斯说:“在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已经有人提出了驱逐我们的议案,此事想必您已经得知。是普鲁士要求驱逐我们的;可能是聊以抚慰他们在密探事件中所受到的创伤。至今为止,联邦委员会对此事一再拖延时间,迟迟未作决定。我们已经得到通知,说如果下星期五以前还没有什么结果,就可以认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同时施留特尔也指出,报纸和出版社在条件已经变得更加困难的瑞士将无法长期坚持。1888年4月1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驱逐《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决议,4月19日决议公布于众。4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不得不告知自己的读者,在本期编辑工作完毕之前不久,编辑部才从报界得知自己被驱逐出瑞士的消息。4月23日驱逐命令仍未

下达编辑部，伯恩施坦致考茨基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点。编辑部可能是在4月24日或25日接到命令的。瑞士报界当然是在作出驱逐决议之后立即公布了驱逐令的全文。1888年4月21和24日《巴塞尔工人之友报》第48和49号就是这样。28日那天编辑部才得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正式刊登驱逐他们的决议和瑞士联邦委员会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在同一号上，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瑞士合作印刷所和人民书店”的领导康·孔采特在社论中指出，瑞士政府的这一行动有悖于瑞士的基本法律准则，并表示准备暂时代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务。

随即编辑部收到了大量抗议驱逐的来信，这些来信还表示了对编辑部的巨大同情。孔采特在他的社论中写道：“这种驱逐行为不仅在瑞士工人中间而且在一切具有独立的共和思想的人们中间都引起了轰动和强烈的不满，不只是已经召开的和正在筹备中的公开集会，而且一部分从共和主义立场出发堪称‘相当好’的报刊的那些评述也都证明了这一点”，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给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多方面的帮助，他们不仅为报纸的继续发行四处奔走，而且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并肩战斗，使两国政府的阴谋没能达到预期的成效，反倒进一步加强了报纸的影响。在苏黎世火车站的送行变成了声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强烈抗议瑞士政府这一行径的有力的示威。^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开始准备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报社迁往伦敦。这需要十分谨慎，所以恩格斯劝告他的同志们，先不要公开这一计划。倍倍尔同恩格斯自始至终保持着通信联系，他曾请求恩格斯帮助这些苏黎世人。当时恩格斯所关心和操劳的，主要是使这些苏黎世人能比较顺利地开始在英国的生活和工作。这里所发表的新发现的一封信的草稿也就是恩格斯这种努力的一个具体表现。恩格斯之所以要写这

^④ 爱·伯恩施坦：《流亡岁月——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1913年柏林版第159—161页。

种信，是因为想使英国公众能迅速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的真相和瑞士政府对采取这一措施所作的破绽百出的解释。从草稿的内容来看，恩格斯依据的是瑞士政府提出的驱逐理由，这些情况显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报界公布之后立即告知与他的。因此可以断定，恩格斯一得到消息，就在4月25日或26日写了这封信，并迅速寄出。据推测，这封信同时寄给了数家资产阶级报刊和社会主义报纸。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查明，这封信曾被两家伦敦报纸分别全文刊登和部分转载，即1888年4月28日社会民主联盟机关报《正义报》刊登了信的全文，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公益》周刊在同一天刊登了信的提要。

在《正义报》上刊登的那封信署名为卡·考茨基，和恩格斯写的这封信的草稿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据推测，是恩格斯请考茨基用考茨基自己的名字将信寄给《正义报》发表的。因为考茨基当时住在伦敦，并且和恩格斯一道在为那些被驱逐的人创造最有利的工作条件而奔走。无疑他十分乐意满足恩格斯的这一请求。只可惜目前还没有掌握任何直接的材料能证实这一推测。

《公益》在1888年4月28日这一期报道了驱逐事件。在号外中它告诉读者，说编辑部在报纸付印时收到一封重要的来信，提供了许多关于驱逐事件的情况。《公益》编辑部概括指出，瑞士政府显然是迫于德国最高人士的压力而采取这一行动的，而驱逐本身则是俾斯麦对他在帝国国会遭到的失败所实行的报复。《公益》摘要刊登的那封“重要来信”恐怕就是恩格斯这封信，或者是别人按照恩格斯这封信的草稿所写的一封信，可惜《公益》没有说明寄信人。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恩格斯并不是打算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封信，因此草稿的上款写了两个。恩格斯认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准备迁址伦敦时，最好在报界不要使他的名字直接与此事联系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些。于是他便请求他

的朋友们以他们的名义把这封信寄给各家报纸编辑部。对恩格斯来说,为在报刊上对某些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同时考虑效果而隐去自己的名字,这样做并非异乎寻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一部分第31卷还有可以说明恩格斯采用这样一种处理方法的例子,例如1889年5月4日《工人选民》周刊发表了一封法国社会党人沙·博尼埃的信,这封信就是恩格斯写的^⑤。当时,即将于1889年7月14—20日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正在筹备之中。恩格斯多次写信给拉法格夫妇,告诫他们,在美国报刊上揭露法国工人运动机会主义者的阴谋,对于能否争取到英国工人对这次代表大会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恩格斯亲自写了这样一封信,并请当时住在伦敦的积极支持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博尼埃把信寄给《工人选民》编辑部。另外还有两个实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就从旁说明新发现的这封信的草稿也属于这种情况。恩格斯考虑到应及时地客观地分析瑞士政府驱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机,于是便亲自起草了这封信,以便让考茨基和其他战友投递出去。

恩格斯也亲自出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迁往英国给以直接帮助,例如为编辑部和报社找房子,为被驱逐者安排住处等等。7月6日恩格斯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谈到为了寻找一处能满足业务要求的房子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时,他说:“我们的苏黎世朋友们还没有安顿好,但是已经有门路了。最令人吃惊的是,伦敦专利房产主规定的制度造成种种麻烦、拖延和挑剔,他们按自己的条件给房客作了规定,因此,你要从这些房客那里弄到一个办公地点(而且你必须这么做),你就得等待大房产主什么时候才准许你开始必要的张罗。”^⑥受倍倍尔之托,保·辛格尔前往伦敦,帮助解决建立印刷所的困难。1888年7月23日恩格斯在给劳·拉法格的信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23页。

⑥ 同上书,第37卷第68页。

中欣慰地说：“我们的苏黎世人终于安顿好了。”⑦ 1888年10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伦敦正式出版。

从此恩格斯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建立了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对报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伯恩斯坦发现恩格斯不仅是有求必应的顾问，在办报工作上完全可以依靠他的丰富无比的经验，而且他自己也发现成了恩格斯与欧美工人运动国际联系的“受益人”。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不仅是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代言人，而且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代言人了。

这个草稿原文为英文，中译文是根据民主德国出版的《工人运动史论丛》1988年第2号发表的德文本翻译的。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72页。

马克思早期思想和哲学共产主义

赵 仲 英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在德国曾经出现过“哲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它是德国哲学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奇妙结合。哲学共产主义曾否构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中介或过渡阶段,这虽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①然而它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却是毋庸置疑的。

1844 年马克思实现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转向唯物主义立场,从民主主义立场转向共产主义立场,这与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中开始分离出的两种趋向有着密切联系。其中的一种趋向是:费尔巴哈由对宗教的批判进而发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所创导的自我意识,同宗教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提出要彻底批判宗教,就必须建立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另一种趋向是:莫泽斯·赫斯由对政治的批判进而发现社会的不平等是来源于私有制的存在,是由于金钱的异化。因此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研究马克思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不仅要對费尔巴哈与青年马克思的关系,作出更深一步的探讨,而且对以赫斯为代表的哲学共产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关系,也需要作出科学的评价。

一、哲学共产主义

18世纪至19世纪初由法国掀起的两次伟大思潮，曾经席卷着整个欧洲大陆，一次是18世纪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潮；另一次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这两股思潮对法国的紧邻、即当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处于落后地位的德国，就不能不产生出强烈的反应；尤其是后一股思潮则直接与德国近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相联系着。当时除了从旅法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产生了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外，在德国本土的知识界中，一部分原来坚持民主思想的人们，也开始重视已在法国出现和将会在德国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这就促使着他们去了解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使人感到有趣的是，当时由普鲁士政府派往法国了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并且监视旅法德国工人活动状况的罗伦兹·冯·施泰因所写的《现代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竟成了德国知识界了解法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本入门手册。

但是德国哲学共产主义代表人物赫斯的思想，却是直接来自他在巴黎时期所接受的傅立叶、巴贝夫等人的学说的影响。赫斯早年到过荷兰、法国和瑞士，并在巴黎居住。他通过自学读了斯宾诺莎、卢梭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人类神圣历史》中曾提出：当今社会上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不平等，是私有制与继承权出现的结果；社会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顶峰；金钱贵族代替了门阀贵族。由于财产的集中和人民的日益贫困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但这将不是一场政治变革，不是改变政府；而是社会革命，它将通过废除私有与继承这些形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最后恢复人类的平等与和谐。^①

^① 参看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卷第254—255页。